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4.007

## 《沧浪之水》：知识分子新的道德谱系之寻找

陈若谷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知识分子常陷入生存和道德的双重困境里。知识分子被规定的道德，往往来自于儒家文化和西方知识传统，但是二者在中国的语境里不可能获得均衡发展，传统的道德标杆依然是第一大谱系，这其中必然会发生认识偏差和现实纠缠。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沧浪之水》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溃败史，而应该肯定其表现了知识分子寻求摆脱精神困境时在方法上的突围，即作品通过解剖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系，展示利益和仁义的矛盾纠葛，表现出积极寻找新的道德谱系之精神向度。

**关键词：**《沧浪之水》；知识分子；官场权力；义利之辨；传统道德；道德谱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9)04-0055-07

**引用格式：**陈若谷.《沧浪之水》：知识分子新的道德谱系之寻找[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4): 55-61.

### *The Water of the Waves: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of Intellectuals*

CHEN Ruog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s often fall into the double dilemma of survival and morality. The moral values of intellectuals mainly come from Confucian culture and Western knowledge tradi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factors is not balanced,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constitutes the most important moral pedigree, which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cognitive bias and reality entanglement. In this sense, the novel *The Water of the Waves*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spiritual collapse, but as a breakthrough of a method to get rid of mental dilemmas. By anatomizing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show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interests and benevolence, the novel reveals a new spiritual dimension to construct a new moral pedigree.

**Keywords:** *The Water of the Waves*; intellectual; official power; morality and interests; traditional morality; moral pedigree

1946年，九叶派诗人曹辛之以杭约赫为笔名，  
写下诗歌《知识分子》——  
多向往旧日的世界，你读破了名人传记：一片

月光、一瓶萤火/墙洞里搁一顶纱帽。在鼻子前挂  
面镜子，到街坊去买本相书。谁安于这淡茶粗饭，  
脱下布衣直上青云。千担壮志，埋入书卷，万年历

收稿日期：2019-05-25

作者简介：陈若谷（1989—），女，新疆克拉玛依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不会骗人。但如今你齿落鬓白,门前的秋夜没了路。这件旧长衫拖累住/你,空守了半世窗子。<sup>[1]</sup>

书卷、纱帽、布衣、空窗……这些古典的意象,仍然是描述20世纪40年代历史转折进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典型的关键词,在知、礼、德、权,精神的渴望和现世的框定之间,知识分子打着转儿,苦苦寻找着其存在的空间。阎真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如此开场,昏黄灯光下,因为逆流而上的诚实加上恶之庸众陷害而遭遇贬谪的父亲池永昶,摩挲着古代高洁之士的文字和人生——司马迁、嵇康、文天祥、谭嗣同……慢慢咀嚼和消化自己的坎坷。儿子池大为在恢复高考后抓住机遇考学至北京,得到硕士学位后一步步在省城的单位里挣扎。小说以第一人称——主人公池大为“我”的视角进入他对父辈命运、人性内外和学院、官场、社会的观察。

从父亲的一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开头,到把它在父亲的坟前点燃,这个严密的叙事闭环,似乎悲剧性地宣告了池大为父亲所秉持的那种知识分子气节的远去。不过,无法忽视的是,池大为在许多关节处体现的对善良公正的困兽犹斗姿态,都是灰烬之下的隐忍火苗,遇到健康的氧气仍可能重展光彩。本文无意于以知识分子的人生浮沉对异化进行控诉。既然某一种氛围和生态是无法逆转的存在,那么“不仁者可与言哉?”《孟子·离娄》如此阐述,有孺子歌沧浪之清浊,而孔子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因为“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在自侮与被辱之际,知识分子审度着德、利、势,在这狭窄的空间中摆动踟蹰。因此,此一小说可以被看作作为命运主体的知识分子在退进之间的生存指南。当然,池大为的道德人格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更为理想的阅读行为是,清理这个故事背后的结构:“知识分子”身份的来源和去路,知识分子道德和价值的普适性,这个群体如何主动和被动地担负起属于他的社会责任,旧有的文化认识如何内化成他的精神资源。

### 一 权力的知识化脸谱

无可否认,古代社会只存在一种权力:皇权。因此传统知识分子读书必然是为了考取功名、服务皇帝,“兼济天下”是最高标准,“独善其身”

则是穷窘之途的最后坚持。在权力-知识关系的狭窄通道内,涌现了无数神童学而优则仕的传奇和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故事;另一方面,也不乏考场失意疯疯癫癫如范进之流,他们是古代读书人版本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之人。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则往往受益于完整的、相对独立的教育制度,从学校里获取劳动技能;但当寻找工作岗位之际,具有象征意义的学历可能比学识更为重要。池大为的职业道路选择中就渗透了多方影响,他本打算回到省城中医研究院,但卫生厅马厅长希望留用当时唯一的硕士作为单位人才政策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不是知识所代表的客观纯粹世界,而是内在于评价等级秩序的权力的象征物——学历,决定了池大为的去留。

被重视氛围所环绕的池大为选择留任机关,在“钻业务”和“搞管理”之间选择了后者。这看似偶然,实际上不仅与父亲的教育和期待相关,也顺应于潜意识中的参政冲动。传统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路径使他们的人格有高度依附性。即便在现代语境里,谋生、就业、出仕等也与接受教育的机会密不可分。池大为的父亲以困厄的命运实践了道德承诺,但是他却以习焉不察的形态默默为后代描画了不同的人生。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飞来,父亲竟激动得脑溢血突发,进而身亡,因为他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路线:升学—知识—生存权,池家有望通过知识扭转乾坤。这种期待也隐含着对“文革”后新的历史纪元和生存空间的想象。无论如何,赋予广大人群学习知识的自由,一部分人经由知识可能抵达更大的自由——从知识到权力,再到天下责任,这是历史发展中的阳刻。而凹陷之处,反过来看就是历史的阴刻:无序的权力,扭曲的知识。

池大为的选择是被动地激流勇进。在行政单位的管理岗上,他体验到的一切,是让自己对他人的生死遭际保持冷漠,这完全背离了当初大学暑期田野调查时行走的介入姿态。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生怀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理想和情怀,但良知却让他们在与丁小槐之类小人的交往中处处吃亏。丁小槐在池大为蜕变的关键时期作为镜像而存在。早入办公室两年的丁小槐早已把道德感受置之度外,他向着利益冲锋,对权威倒戈的功利心态在身体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领导身边他侧着身站立和走动，完全罔顾尊严；但是他在现实中“吃得开”，比如池大为的妻子入院分娩，就是丁小槐帮忙才化解困境，这仿佛在嘲讽池大为不屑又不忿的姿态。

在单位浸润几年之后，池大为惊讶地发现，职称评定并不全依凭医德医术，而多半是权力斗争的尾韵。作为医学研究者，自己的论文不仅需要打通发表和申请课题的渠道，更需要权力将学术成果转化象征资本。无奈地身处缺乏监督的恶性权力网络中，只有马厅长加持，学术水平才可能顺利变现，兑换为博士学位和博导资格。在这条背道而驰的大道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赋闲在基层的晏之鹤，一个是被“贬谪”到农场的戴妙良。前者因为物质困顿无法拥有真正的雅致气象，戴妙良则更为可悲。戴妙良生前还存有一丝主动选择的自由，死后却被人戴上“精神文明典型”的笼头，成为权力的工具，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颇具分量的报道《名利淡如烟云，事业重于泰山》帮助卫生厅博取了美名。由此看来，权力不仅强大还十分隐蔽，它能够收割不同的声音，又幻化出各种各样的脸谱。

卫生厅里上至马厅长、下至丁小槐都代表了单位/职场/官场的权力地位和角色分工，几个青年的成长之路能够清晰地发现权力的形塑力。当年同池大为一样笃信理想与良知的胡一兵和刘跃进，代表了社会上的另外两条道路：胡一兵新闻系毕业后投身理论上的公共空间——传媒行业，刘跃进从哲学系毕业后跻身于较为清贫的青椒行列。在科学和学科体制逐渐独立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可以沉潜到精微的专业领域中，但是学院体制也是由一种单极价值主导的，因此他们“通过改造，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汰，所余是平庸与卑贱，一言以蔽之，角色丧失”<sup>[2]</sup>。本应在话语场域和知识领域提供智力支援，但在严密的社会控制中，他们无法对生活的乱象做真正的回击，甚至无法说服自己的家人甘于边缘的生活。在阎真另一部小说《活着之上》里，历史系教师聂致远根本撼动不了大一学生的功利价值观。另一边，新闻工作者胡一兵奔波在被各种利益和话语挤压的狭窄言论场域，既无法实现社会抱负，也不能换取充裕的物质生活，因此他毫不顾忌投身于商品市场，从一个想象中的公共空间退回到及物的市民社会。

知识可以用来证明知识分子的价值和独立性吗？答案是否定的。想用知识绕道权力，去获取现世利益、伸张社会正义需经历千难万险。虽然理论上说，知识接通的不再是出仕这一条单行道，但现代的学术、社会、市场依然掣肘于体制。“真理”变成了一种非常相对的事物，权力自然深深埋伏在客观知识与主观价值的脊梁之内。福柯曾经评说道：“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法治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sup>[3]</sup>不止人文学科，即便是客观数据也可以按照权力的要求重新进行演算，比如让池大为耿耿于怀寝食难安的血吸虫病，华源县的发病数据就被人为造假、指鹿为马。这也证明的是权力戴着科学的面具，征用人的语言，天罗地网般笼罩着一切领域。

如一个细节所展示的，池大为与妻子去厅长家攀关系时，“把左手往脸上一抹，算是戴上了面具，心里沉着了些。”<sup>[4]</sup><sup>202</sup>他一次次因为时势而低头顺从，但在心里默默还坚持着那个保有某种差异性的真实自我。直到有那么一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自觉地皈依了丁小槐们——也侧身站在领导身边。久而久之，虚伪的面具就难以摘除了。一个自我厌恶的脸孔正式诞生在池大为出任厅长之后。改革遭遇重重阻击，他终于认同了马厅长的手腕和作派，并且自然而然地行使了自我“束缚”。此时的池大为惊讶地发现，他对于耿介不阿的同志小龚——年轻时自己的化身，常常生出厌恶之心。对此，有论者认为“阎真的模糊姿态与暧昧立场所造成的叙事裂缝，给了这一部分接受者为池大为的堕落进行强力辩护的可乘之机”<sup>[5]</sup>。实际上，毋宁说这个环节的设计印证的是失败了的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因为从根源上看，池大为所面对的就是一场权力的鏖战，心灵甚至都不是与之对垒的选手，而是被牺牲掉的边角料而已。

## 二 现实维度中的义利之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学说的这一判断是《沧浪之水》与《活着之上》中两位主人公惶惑的起点：“一个知识分子，他怎能这样去想钱呢？”<sup>[6]</sup><sup>32</sup>在聂致远看来，人虽然有利己之心，但是也有并不以计算为逻辑的非理性利他冲动，尤其对于君子而言，利不应凌驾于人性和品格之上。“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何正面人物，每一



个人都是反功利的,并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身的形象。如果钱大于一切,中国文化就是个零,自己从事的专业也是个零。”<sup>[5]33</sup>比如屈原以《离骚》所奠定的无畏风骨和持守自重的品德,其实正是对于题眼的阐释。他用壮怀激烈的方式,逆转了政治生存的模棱两可和藏污纳垢。张载更是将“天命”发挥到极致,他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都是以道德完善政治、以牺牲成全精神的范例。

而现代时期的平民庶人,既非贵族也非士大夫阶层,无力肩负别人的命运;保证自己的独立存在,才是首要工作。造成这种区隔的首先是民族判然有别、阶级棱角分明,其次是国家区域的蜿蜒界限,再次还有现代逻辑里的权责之分。池大为父亲1957年写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显然是以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池大为在生活中的遭遇却说明古典精神是无法企及的标杆,也是不适用今日的天方夜谭。世界被商业和武器打通后,清帝国的19世纪已然迥异于18世纪,更遑论20世纪。传统道德价值的转化在遥远的时空距离里显得力不从心。梁启超说:“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sup>[7]</sup>这也是导向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人生价值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吗?什么是善和恶?什么叫道与势?在一个现实运行结构中,人可以如何自处、自持?人生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体现?这些问题在接踵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年代,失去了继续深入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些问题又被摆了出来,且因为90年代的突然降临,整体社会面对的不仅仅是行为模式、精神标准的转变,还面对一个更为扎实和峻急的问题:人格究竟皈依何处。

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辩论,与“科玄论战”一样,并非针对的是意识形态,而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发生的、以自己以及自己的创造物文化与价值为反思对象的论争”<sup>[8]</sup>。无需揣测作者是否受到了90年代上半期“人文精神”呼声的鼓动,但产生于90年代后半期的这部《沧浪之水》,无疑清晰地展现了90年代世俗化的历史语境,它也同时回答了我们如何终结了思想意义上的“80

年代”的问题:随着政治转型和改革的降温,经济的市场化遇热膨胀,文化启蒙的空间被压缩到角落,最原始的拜金主义在市场经济中势如破竹。80年代文化所呼唤的“现代化”的叙述,在90年代仅仅过于充分地兑换了题中应有之义的物质利益。

20世纪80年代的“再启蒙”提供的是关于“人”的学说和想象,但此前社会主义“新人”建构过程中,仍然出现过一些无法被归类的人,他们是《在医院中》的陆萍和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林震,他们心内充满困顿和委屈、拘谨与耻辱——但这被视为暂时的难题加以搁置。直到呼啦啦涌入了各种阐释学说,人的维度才变得更加多面立体。先锋文学和新写实小说揭示的人的挤压变形,其表现的是在生存场景中,在市场上大家尔虞我诈,在单位里彼此勾心斗角,最可怕的是,这一切竟然还隐藏在微妙的平衡生态下。无论是朝气蓬勃的稚嫩青年,还是久经考验的成熟官僚,都被无形的文化摆布着。90年代的社会大转型,似乎印证了金钱万能,但谁也不敢断定它将带来新的公平还是会加剧不公平。因此,在《沧浪之水》中,不仅有马厅长们,还有搞虚假宣传卖假冒伪劣产品的亲戚,有钻营漏洞的资方,也有蠢蠢欲动一心想发财的小百姓。逐渐攀爬到官僚大厦顶端的池大为,忽然也看清了经济的运行法则,并在法律框架下为自己谋取“合法”利益。

“生活中有两种逻辑,良知的逻辑和生存的逻辑,按理说这两种逻辑应该一致,尽良知的责任就是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sup>[4]157</sup>然而金钱、体制、市场、效益……当它们滚滚而来的时候,被扑面打翻的知识分子自然被权力结构、经济规则直接或间接诱发了人性异化。孔子和文天祥们的形象,教给人的是见性、守成,鲜少涉及现代理性经济人的能力,以及与复杂人群交际的技术。池大为、聂致远等人,在入大学之时就一厢情愿地把自己指认成“知识分子”,却未对自己所向往的人格进行任何反思,也没有考虑伟人们的真实处境,正如聂致远妻子赵平平所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塌糊涂,一败涂地。”<sup>[6]33</sup>池大为说:

“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

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活着是唯一的真实，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sup>[4]280</sup>

活着是唯一的真实，身体就是活着最重要的证据。在义与利之间，池大为的身体向着利偏移。这是不自觉发生的，甚至是必须发生的。让池大为真正疯癫的是儿子的烫伤事件，逼仄阴暗的生存空间不仅压抑了心情，也切实地威胁着他们的生存。儿子身上的伤口，粘连着皮肉撕扯的是池大为的心脏，妻子甚至认为无能的池大为不配做儿子的父亲。“肉体痛苦不再是刑罚的一个构成因素。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sup>[9]</sup>这次意外在池大为看来就是社会权力对自己的惩罚，由于这次巨大的精神惩戒，他的灵魂命令自己进入“监狱”一般的游戏规则里，成为最驯顺的一具身体。池大为虽然仍敬重高洁的品格，但是他很清楚自己不能以短暂的一生去肝脑涂地地实践那种人格追求。至此，道德诉求才一点点撤退到视野之外，实现了最终的剥离，甚至还多次粘连着筋骨肌肉。

蔡翔曾将反思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自身：

“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英思想是否本身就与现代社会有着某种潜在的对立。‘启蒙’的活动方式被迫解构后，他们能否接受新的言说方式，比如对话的方式，独语的方式，等等。”<sup>[10]</sup>池大为的故事几乎是对话体串联而成——主要是自我的对话，并在《活着之上》中得以延用。因为它们面对的再也不是民众或者敌人，而是自己。无独有偶的是，以知识分子为叙述主体的小说常常运用多声部对话形式，比如李洱创造的应物兄也惯于以舌根下的气流自言自语、自我判断。而池大为则在头脑中经历风暴：“我”的内心与“我”的面具、“我”的追求和“我”的处境、父亲的命运和孩子的未来，种种拉锯最终扯散了他的坚持，他从“人之子”蜕变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

慎独的人格操守和义无反顾的责任是知识分子的“元”叙事，一旦脱离这个前提，在利和义之间徘徊，也就不再成为知识分子故事，而变成了职场、高校、官场等空间主导的叙事了。从话题外部看，当今的知识者未被赋予天然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这是一个个体生存的年代，在意识层面，

我们的社会又远未形成可滋生尼采学说中“超人”意志的土壤。西方文化呼唤批判型知识分子，主要是由于西方的文化政治体制相对稳固，允许存在知识分子不妥协的道德。在这种成熟的第三空间形成之前，每一个天然人，都“孤单地独自面对着更为庞大的由权力和金钱搭建的卡夫卡式异己的城堡”<sup>[11]</sup>。理想对现实的离心力很难持续太久，像池大为这样被君子道德哺育的知识分子，在飘飘忽忽反反复复之后，仍然向着现实的地心引力重重坠落了。

### 三 寻找新的道德谱系

在解剖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系，利益和仁义此起彼伏的纠葛之后，我们必须回到人的道德这个终极问题之上。虽然道德作为人类精神之一面，必然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甚至被客观物质形塑，但是不可能就此解除探讨的必要性。犬儒派在被阐释为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单一面目之前，更重要的面相其实是他们极端理想化的道德追求。狄奥根尼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在孟德斯鸠看来，这就是一种居住在心中的精神。

无论如何，这都要指向对于好的与属“人”的理解。在近代科学进入“人”之后，人的精神总是和纯客观的科学缠绕在一起，心理也被精密的化学物质划分和界定了。其实，在池大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道德产生了对于善的需求，作为一个原生的人类，他也是纯善的。他在家与妻子关于平民视角的争辩，说明了他的良知其实并不来自于他所认为的知识者的担当，恰恰来自于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天性。因此，《沧浪之水》的讨论里，既有新事物——市场经济法则，也有旧的痼疾如官僚体系和官僚作风，以知识分子的沉痛心路对这两座大山加以批判固然悲壮，但最为惊心动魄的是池大为心中的自然法则（良知）一直在与自己辩驳辩难辩解的过程。这份良知是微弱的，但是极为倔强——他并没有把人的生命划分为高低贵贱的不同等级，所以他才为罹患重症的乡村赤脚医生和血吸虫病人留下眼泪，为了替患者筹到更多的钱，池大为反复申说：他是一个人、一条生命。池大为蔑视那些没有风骨的“狗人”“猪人”，他认为连基本的同情心都



没有的人就压根不是人。这不关乎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道德,更可能来源于朴素的乡间伦理和天然的人道精神。也就是说,《沧浪之水》的知识分子叙事有一个更先在的主题:善良正派才是最根本的道德要求。

可以清晰地看见,在池大为和父亲,以及作者自身那里,道德的谱系有两个,除了以上所述的天然人格,另一个就是《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勾勒出的克己复礼的孔夫子、信奉性善的孟子、内不愧心的稽康、肝胆昆仑的谭嗣同等人的精神担当。这里面有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从池大为和聂致远的经历看来,传统的道德支撑作用微乎其微,现实的精神动力转化却还没有完成,比如革命年代的张思德、白求恩,建设年代的王庆喜、孔繁森,或者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大力宣传的以陈景润为首的科学家和劳模王素丽等人,再加上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意识的鲁迅、巴金,甚或是职业化的南丁格尔……他们统统被排除在精神资源之外。池大为也许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有古人的道德才叫道德么?

简单地说,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道德不仅仅是道德,它还进一步转化成了审美精神和历史意识。比如苏轼流离颠沛在“岛边天外”时作《千秋岁·次韵少游》:“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覬,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苏轼一生“行道”的政治功业完全失败了,但是他保全了“道德自我”,在“守道”“传道”中确立了“道”的至高无上。在古人的故事里,事功和道统被严格加以区分。白居易、王安石、范仲淹、苏轼等人的政治贡献被忽视了,他们只留下作为人格精神象征物的诗名。他们的文化人格和诗词歌赋所携带的强大审美力量奠定了一种历史的认识方法。从司马迁开始,把身前身后名交付于历史才是人间正道,历史的穿透性赋予了道德以崇高的美感。反过来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宋代发展到顶峰,有宋一代士大夫崇尚节俭朴素,也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他们甚至关注到了基层的乡约、社仓,但是,大宋因此得以保全了吗?这侧面说明,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通过谱系学分析将道德斥为虚无主义的帮凶并非全无道理。个体生命其实需要依靠某种非知识

和非道德的力量才能探寻到生活的可能性,也就是池大为所说的“只有在可怜可悲之中,才可能与现实发生有效联系,才可能萌生出一点点希望的萌芽”<sup>[4]182</sup>。

在西方,当300多年前亚当·斯密左手写《国富论》、右手写《道德情操论》的时候,物质和情操中间其实有一条清晰可见的桥梁,利己是人的切经济行为的动机,利他也可以是利己的一个副产品。卢梭在写作《社会契约论》时认为,中产阶级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在理想制度里,公意具有坚实的前提条件,理性经济人的道德情操也需要有一个理性的群体共同维护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环境。再回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里,“知识即美德”。这其中的推导在于,知识带来的理智与道德是相关的,理性是二者之间的有效通道。即便这些思想家的理想并没有生成良性的实践,但必须承认,再理想的社会构想也不应漏掉实际的现实环节。回头来看,也许暂时可以下一个断言:古典的传统道德谱系没有被成功地接续到现代生活之中,当代现象还期待着新的方法和观念来解释。

知识分子的道德是无法单独存在的,修史编述要在国家的研究机构里进行,天文观测和年历推演更是必然依附于某种“天道”。当代知识分子始终不曾属于一个明确的阶层,他们并非精英阶层,只有游离的社会身份,多数时候他们充当的是脑力劳动者。作为一个人群而并非社会存在的现实,使得知识分子不可能直接制造出文化力量,也很难对社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巨大而多元的物质世界,丰富又正当的欲望,不能因为某种道德理想主义或者道德审美需求就遭遇全盘否定,知识分子能够做的事情是,即便无法认同当代社会的原则,也必须利用自己所学去使社会结构尽量向更合理的方向调整。也就是说,“道德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本身没必要存在。在经济大潮下、在全球化背景里、在科技日新月异社会节奏齿轮互嵌高速运转的社会里,应该有职业化的、专业的知识分子,这才能帮助他们取得一定限度的独立身份。

好在《沧浪之水》的作者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他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轨迹。池大为的故事刺激着读者这样提问:目

前看来，经济规则、法制观念和思想市场组成的这个现世世界还没有构建出新的稳固价值、规范，那么在道德方面，知识分子能够承担起一点自己的责任吗？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事情也就变成了不是知识分子的道德可以拯救什么，而是如何操作才能尽量多地弥合现实与良知的裂缝。当然，阎真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但我们看见了池大为由本能和理性主导的那些行动。

掌权后，池大为努力为自己和家人的世俗生活一一买单，因为日常生活欲求是无法拒斥的存在。但是他也并没有报复式地为自己谋取利益，相反，他所能惠顾的人群变得更为广泛。首先他叫停了博物馆面子工程，然后扭转了许多错误的政策，包括给被打压者评定职称、重新启动血吸虫病的调查等，他尽量把每一件工作都安排在正常的轨道中。就如康德所说：什么是启蒙？其不但意味着人作为理性主体的自我解放，而且要进行理性的公共运用。此前，池大为要求自己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现在坚持要做一个有平民意识的“好官”。可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角色转换，退场的是他对于知识分子道德不切实际的想象。为蜕变后的官员池大为辩护并非本文的本意。毕竟，官僚制度造成了人的精神萎靡和智力萎缩，这种以自我保护和自我繁衍为主的机制不能创造真正的精神价值。本文想要声明的是，个人所理解的社会责任以及履行方式本就千差万别，尤其是针对不同的行动和观念领域，更需要调适不同的规律。在专业之中行使自己的权利和权力，看起来不像知识分子。不过，池大为主动地把道德置换成了职业责任，这种“就是想做点事”的觉悟可能意义更大。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群体沉潜到书斋里，开始倡导一种“岗位意识”（陈思和语），而那些因为诸多原因进入了社会生活各行各业的知识人，也需要进行一些专业方面的“原始积累”。

真正的德性空间需要每一个生命主体借用便利条件，自己去争取和创造。

《沧浪之水》本身是一个诗性文本，“跑到街口我回过头望着教堂，十字架在微光中耸立着，指向天空。可是，在它的后面，开张的立华商厦耸人云天，灯光从下面一直打上去，将大厦笼罩在金黄的光辉之中。”<sup>[4][18]</sup>在作者笔下，池大为蜕变时每一次的心灵震颤都可谓纤毫毕现；然而我更愿意以一种社会的、思想的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这应该是使小说更加饱满和坚实的依据，也是其提示给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所在。

#### 参考文献：

- [1] 杭约赫. 知识分子 [M]// 杭约赫, 郑敏, 唐祈, 等. 九叶集.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106.
- [2] 夏中义. 人与国家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14.
- [3]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 [M]. 严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1.
- [4] 阎真. 沧浪之水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5] 黄声波. 权力·人性·知识分子: 阎真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研究述要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15(2): 15.
- [6] 阎真. 活着之上 [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 [7] 陈崧.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M]. 修订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361.
- [8] 陶东风. 90年代文化论争的回顾与反思 [J]. 学术月刊, 1996, 28(4): 34.
- [9]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M]. 修订译本, 4版.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11.
- [10] 许纪霖, 陈思和, 蔡翔, 等. 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 道统学统与政统 [J]. 读书, 1994(5): 48.
- [11] 郑坚. 末代文人的“事业”成功史和精神颓败史: 读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J]. 理论与创作, 2003(1): 54.

责任编辑: 黄声波